



徐光耀的“孙犁情结”(下)

苑英科

五

徐光耀对孙犁艺术风格的认知,也比其他人深刻许多。孙犁一生以鲁迅为师,其文学创作深受鲁迅影响,越到晚年越是如此。2005年12月,徐光耀在给阎庆生的信中写道:“我之所以钦佩孙犁,一部分原因是他一直在推崇鲁迅。他从鲁迅学了很多东西,他可以叫做刻骨铭心地学。我学鲁迅是皮毛,而孙犁才是真的‘化’为自己的东西。”他十分真诚地说:“至于文学的技艺方面和秉持的现实主义,我是近学孙犁,远学鲁迅的。而孙犁最好地学了鲁迅。”徐光耀这样说,自然有自谦的成分,他学鲁迅也得其三昧,所以才能写出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等一批力作。但“近学孙犁,远学鲁迅”,的确道出了他的“孙犁情结”。

徐光耀同样具有深邃的思想,他对孙犁文学风格的认知,没有停留在对“荷花淀派”文学风格的解析上,而是敏锐捕捉到了孙犁晚年文学创作上的“鲁迅遗风”,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

进入晚年的孙犁,文学审美观又有相当大的变化,尤其是思想,时常闪出锐利的锋芒。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、呼唤、呐喊,虽然温婉婉转,但更本真更血性了,可谓隐锋芒于敦厚,藏讽劝于蕴藉,对时代风潮、社会利弊,每于字里行间作善意而痛切的鞭笞和扬弃。

孙犁早期文学作品中那些美丽勇敢的青年女性,带有白洋淀清新水汽的场景,具有浓郁浪漫色彩的抒情文字,形成了他鲜明的艺术风格。他晚年的作品却带有强烈的“鲁迅遗风”,战斗性越来越强,风格变得沉郁冷峻。在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中,前期的“荷韵”与后期的“鲁风”交融在一起,构成了一个立体的、多维的孙犁。

六

1993年夏,孙犁因患胃癌动了一次大手术。由于身体虚弱,他很长时

间没有读书写作。1994年4月18日,徐光耀等人到天津参加梁斌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研讨会。会议间隙,他与韩映山、段华一起去看望孙犁。

据韩映山记述,他们进屋时,孙犁刚理完发,衣领还翻着。见到徐光耀,孙犁有些激动,说:“咱有30年不见了。映山来我知道,没想到你来。你这么瘦呀?有什么病?家里有什么事?”

徐光耀说:“我有冠心病,为孩子的事操心。”

孙犁一摆手:“咳!孩子的事,管他们干什么?就是别管。”

大家哈哈大笑,坐在一起谈往论今,其乐融融。考虑到孙犁大病初愈,前来看望的人很多,怕他累着,大家匆匆而别。临别时合影,孙犁让大家坐下,都一把年纪了,不要站着,甚至说:“你们不坐,我就不照了!”

这是徐光耀与孙犁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七

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徐光耀和孙犁通信频繁。他们不仅关心对方的创作,关心文坛上的新人新作,更多的时候,他们像老友一样聊天,说些疾病养生、古董收藏、书法艺术等方面的话题,看似闲谈,却蕴含着彼此间的关心关爱,激发着心灵上的共鸣。细细品味这些书信,仿佛看到两位老者置

身山峦环抱之中、古松溪流之旁,沐浴清风,述说心曲,物我两忘。

1995年5月18日,孙犁在给徐光耀的信中谈古董、谈养生,并饶有趣味地说道:“叩齿一法甚好,古人云:养目如养女,养牙如养兵,就是这个意思,可惜我无常性,想起来就叩几下,想不起来的时候多。”在这封信寄出的时候,孙犁在信封背面写下一行字:但愿这不是最后一封。

孙犁不会无缘无故写下这句话。5月15日清晨,他像往常一样下楼散步,着风受凉,引发了前列腺疾病,小便不畅,睡眠不佳,神经衰弱卷土重来。他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垮掉,执笔为文将会成为一种奢望。

1993年做完胃部手术之后,1994年10月12日,孙犁在给徐光耀的一封信中说:“文章,恐怕一时写不成了,不是绝对不能写,是不愿再沾这个边,想就坡下驴。”但是身体稍好,他便恢复了创作。因此,徐光耀一直抱有幻想,觉得孙犁还会像过去那样,不过说说而已,最终依旧是:“其曲终能再奏,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,指点江山。”

但这次他失望了,1995年5月18日的信,成为他们之间的最后一封信。

2002年7月11日,孙犁逝世。徐光耀说:“孙犁逝去了。但一颗明亮的文学之星,将永远地亮在天上。他使我们善良、自尊而骄傲。他是真正的文学家。他不会死的。”

2025年春,已是百岁老人的徐光耀,为雄安新区“荷花淀派文学馆”题写了馆名。那几个苍劲古朴的大字里,熔铸着他对孙犁历久弥坚的敬仰。

盛开的花朵、晚霞、便利店的包装袋……只要色调契合,都可以纳入镜头。

网络新词语

Color Walk

王锦辉

总而言之,Color Walk是一场用色彩重新定义城市的漫步活动。它把普通的行走变成了一场发现美好的游戏,让平凡的日常,处处充满着微小而确定的幸福。

Color Walk可直译为“色彩漫步”,是在City Walk基础上衍生出的限定出行玩法。具体来说,就是出门前选定一种颜色,比如青草绿、克莱因蓝,随后在城市街巷中漫步,沿途寻找并拍摄记录下带有该色系的事物。拍摄对象没有限制,路牌、街角的邮筒、

凡常之美

莫小米

追“霞”。

为了报得更精准,他自学编程写代码,现在又用上了AI。受人信任,共享快乐,凡常的日子原来可以这么美。

有宏大壮阔的美,也有细枝末节的美。

说到每个人都拥有的证件照,表情、姿态、角度都需中规中矩,好看与否尚在其次,这是共识。

但在杭州却有一个传说:“去某某派出所拍身份证照片最好看。”是啊,这张照片用途最多了,谁不想拍得好看一些呢?

这正是几位女警们的想法。

户籍警的工作也许最平凡琐碎,少有高光与功勋,日复一日地坐在服务窗口,登记,办证。

她们所在派出所的人像采集室,

一进门,一面大镜子,一个简易化妆台,化妆台上有护肤品、粉底液、各种夹子、口红……梳子就有五把。

有位小伙子照了照镜子,犹豫道:“头发有点长,行吗?”

她答:“头发不能遮住眉眼,用一下发泥吧。”

小伙笨拙地尝试,怎么也抓不上去。她帮他整理了头发。小伙拍了三次,选了一张自己最满意的。

还有两个衣帽间,四季各式服装,可供替换。

圆领短袖针织衫、泡泡袖短款、“小香风”外套……牛仔马甲、格子衬衫、复古风立领衬衫……

服装都是精心挑选的。她们有经验,女人无论老幼,最在乎“显白”;男人则喜欢低调优雅,有质感。

一位老奶奶被女警认真打扮一番,拿到照片又惊又喜,从没想到自己还能拍得那么好看。

美不是奢侈品,却能使凡常岁月熠熠生辉。

影视剧中,驿卒披星戴月、嘶吼“八百里加急,挡路者死”的画面,是古代极速通讯的经典符号。这热血场景背后,藏着农耕文明时代王朝能触及的通讯最高极限——以人马为载体、驿站为节点,用血肉铺就的“信息高速公路”。

八百里加急

张希

这个速度源于制度、人力与物力的极致透支。从秦汉奠基、唐宋成熟到明清鼎盛,“八百里”之所以成为它的巅峰标尺,核心在于这已是古人在交通受限下能实现的极致传递速度——自这一概念产生以来,“八百里”便是不可轻易突破的上限,历代虽有尝试,却基本没能突破这一极限。

唐代驿传网络完善,全国设驿站近一千七百处,驿卒逾万人,“八百里加急”为最高等级,仅用于王朝安危相关的军情政令。据《大唐六典》记载,驿卒持铜鱼符、挂银铃,驿站无缝换马,延误便受重罚。即便如此,安史之乱军报从范阳至长安三千唐里,六天送达,日均仅五百唐里,未达八百里标准——一唐里约454米,八百里约363公里,在古代山路与风雨中,已是人力马力极限。

真正实现“日行八百里”的是清代。清代将其纳入《大清会典》,文书需盖军机处火票,驿站优先接待。康熙平三藩时,昆明至北京军报九天送达,日均超三百公里;同治三年,曾国藩攻克南京的捷报,江宁至北京二千四百四十五清里四天送达,平原路段已能稳定实现日行八百里(一清里约576米,约461公里)。这份速度,是“十里换马、三十里换人”的接力,是驿卒血汗与马匹牺牲的代价,也是王朝财力的巨大消耗。

这份用血肉与财富撑起的极限,终被时代淘汰。1877年,中国第一条自主电报线在天津建成,千里消息瞬息可达,彻底颠覆快马传信逻辑,让八百里加急的紧急价值荡然无存。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,官民通用、成本透明,彻底挤压了驿站的生存空间。

1912年,北洋政府裁撤所有驿站,延续近两千年的驿传体系终结,八百里加急也随之落幕。它的消亡不是耻辱,而是进步——作为农耕文明的通讯巅峰,它见证王朝兴衰,而“八百里”作为自产生以来便基本未能突破的极限,终究因依赖人力马力,无法跟上近代化步伐。

如今指尖轻触便可千里传音,我们已难想象古人传信的艰辛。八百里加急化作历史背影,藏着古人的智慧与无奈,也诉说着时代变革的必然:旧时代的极限,终会被更先进的文明温柔超越。

